

第八章 初任外长

1920年8月11日，靳云鹏将军奉命二度组阁。入阁诸员，除我出任外交总长之外，其他各部人选，也多是我的老相识，如周自齐任财政总长，萨镇冰任海军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总长，叶恭绰任交通总长。靳总理是山东人，尽管曾追随段祺瑞多年，但其立场与其说接近皖系，不如说更接近直系。他的好友、顾问张志潭也有相似经历，张此次出任内务总长。本届政府阁员多为开明进步分子，政治派系色彩不像往届那样浓重。董康、范源濂两先生是著名学者，分领司法与教育总长，实可展其才学，用其经验，在政务上有所建树。在刚刚结束的直皖战争中，皖系败北。民意尤其北方民众厌烦战乱，企望和平安定，对新内阁寄予厚望。大总统似乎也信心十足，因为他与入阁各位总长早已熟识，并且非常尊重他们。展望政局，新内阁必将创造光明前景。但财政、外交两方面，则困难重重。

财政部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赎回中国、交通两银行先前发行的贬值京钞。这一年9月，周总长与公债局总理梁士诒先生谈妥，由财政部发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债6000万元，用沿海地区关税余款作担保，收回两行发行的京钞。这一政策一经实施，效果显著，使得拥有京钞的人免受损失，国家金融也因此有了转机。

周先生在财政总长任上要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清理民国建立以来，政府发行的十几种不良公债。这类公债大都缺乏信用，

既不能依据当初偿还规则被人兑回,也无按时支付本息的能力。内债累计总额至少在3亿元以上。整顿计划伊始,由政府增加新税源作为还债基金,并决定将这一统一规划还债的基金交给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Sir Francis Aglen)管理。这一授权不但使中国政府所雇用的高层洋人声誉日隆,而且赋予他太多的自主权,导致外人操纵中国财政的恶果。更令人痛惜的是安氏就任以来的卑劣表现,实负重托,终被解雇。尽管如此,整顿国内公债的工作还是取得相当的成就,过去对公债信誉普遍悲观,现在由于还债基金全部划归海关总税务司专门管理,政府要员不得任意挪用,因此,公债信誉得以改观。

本届政府成立的当月,就遇到了巨大考验。北方五省发生严重旱灾,殃及四、五千万人,为救灾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国际性赈灾委员会,梁士诒先生任委员长,内务、财政、交通三部总长鼎力相助。外交部则通过驻外使馆,向当地华侨民众募集款物,海外侨胞积极响应,慷慨解囊。救灾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这是民国以来的首次尝试,灾民通过兴建或整修道路、桥梁、沟渠和其它一些公共设施的劳动,来偿还赈款。起初,有人认为这种方式是虐待灾民,但是,行之一见成效,不久便被社会接受,认为是合理的,社会其他慈善机构也逐渐仿效这种做法。灾害发生,同时也唤起政府和民众对各种公共事业的注意力,例如:造林、保护河流、发展灌溉系统、运输系统等等。

美国驻华公使柯兰先生(Charles R. Crane)给予赈灾委员会的工作以极大的帮助和深切的关注,通过他的努力,美国红十字会的捐赠尤多,特别是在修路代赈方面。救援灾民工作过后,赈济委员会保留下来变成永久性组织,即众所周知的华洋义赈会(China In-

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继续慈善事业。该会在日后的社会救助工作中成绩斐然。

我就任以后, 对外交总长与各国驻华使节之间的外交礼仪做出较大修改。依以往惯例, 总长上任须先往各国使馆拜会使节, 这种做法与国际外交惯例迥异, 且徒费时日。因此, 我一就职即改惯例, 总长只需派人将自己的名片送达所有外交使团的首领, 并正式照会他们自己已被任命为总长即可。

帝俄驻京公使, 系沙皇时代所派遣, 虽仍列名驻京外交使团之内, 但早已为目前当政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所拒绝承认, 因而我有意识地推迟派人向其递交照会和名片。新政府打算根据其现实的政治地位而取消相应的外交礼遇。当他感到自己的公使地位岌岌可危时, 特来拜会以探明中国政府的态度。我坦然告之, 他的外交代表地位并非正常, 中国政府正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事实上, 当时我国尚无定策来指导未来的中俄(苏)关系, 尽管苏俄方面曾一再表示诚意, 而中方却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 坐失改善关系的良机。

在一次国务会议上, 外交部建议解决这一问题可分作两步。首先, 不再承认帝俄原派的公使、领事等人的官方代表身份, 如果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则有悖常理, 不利于改善与苏俄新政权的关系。其次, 等到时机成熟, 中国将承认苏俄新政府。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 外交部曾暗示帝俄驻京使节自动放弃身份, 但遭到他们愚蠢的拒绝。别无他法, 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发布总统令, 取消对帝俄外交上的承认及驻华使领馆官员的承认。同时, 派遣中国官员接收天津、汉口的俄租界, 以及设在哈尔滨的各级法庭。并派专人托管法庭财产, 以待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苏俄后, 双方商定再行解决。作为支付帝俄使馆费用的部分庚子赔款, 至此也随之停付。

中国政府这一法理兼得的举措,竟招致在京外交使团中的某些人的异议,但经过外交部的广泛解释,异议平息,中国政府也得以按照计划顺利地完成任务。政府信守诺言,为了保证租界的顺利交接,防止俄国侨民遭受不公正待遇,任命精干尽职的官员监管这些地区。哈尔滨等地的俄属法庭,都由政府挑选精通俄语的正直法官充任审判官。苏俄对此反应强烈,认为中国取消沙皇在华机构的行动是久已期待的,值得称颂的。直到中苏正式建交,苏联申明废除已往的不平等条约之际,上述保管行为,方才自动结束。其实,早在1920年11月,苏俄政府就已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租界和庚子赔款以及中东铁路等。

1922年春,恰是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签署的第四十年。届此商约期满之时,中国又未承认苏俄新政权,因此无法与其谈判条约续修之事。然而,中俄两国陆路贸易发展迅速,旧约过时难以适用。中方曾在多种场合呼吁两国修订条约,但是,当时的苏俄政府没有得到多数列强的承认,故中国政府不得不由大总统发布命令申明:从4月1日起,废止原商约中的有关在中俄边境和免税区(两国距边界100里内的区域)内,进出口货物减免三分之一关税的规定。这样做并非是中方的行为武断,而是因为随着中东铁路建成并与西伯利亚铁路完成对接,两国之间陆路贸易减免三分之一关税的合理性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国政府废除了这一贸易特权,开始推行对陆路贸易与海上贸易征收一致关税的政策。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以来,外交部尤为重视中日关系。由于我国当时非常贫弱,人们意识到一旦与这个强大的邻国发生直接冲突,将会带来巨大危险,因此,政府倾力结好其国。在中日两个东

方国家之间,人际关系往往起到促进睦邻友好,消解误会的重要作用。因此,外交部次长总是由留学日本的人担任,四位参事之中,也必任一日本留学者。他们的职责就是研究预测日本外交政策的动向,防止恶化两国关系的事件发生。部内日语流利的官员周旋于日本外交官之间,经常一起出入饭店舞厅,酒色相会,借以交好日方,探听虚实。内阁总长之中,也有人倾心交结日本使节。

中国有句古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部中依此精神,设置了许多新的部门来延揽人才,吸纳新鲜血液,对于资深高级官员优先外派担任驻外使节,所遗空缺,由年轻有为、富于现代意识的人递补。如此奖前掖后,部内人才形成梯级序列。

当时的内阁要员都感到梳理中日关系的契机已经来临,期望两国相安,避免相互猜疑和指责,而能多些相互谅解。

真诚的愿望有助于中日间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至少可以为比较严重问题的谈判,创造良好的氛围。我方表现出的谅解精神得到了回报,通过互让,中日之间顺利地解决了两三起地方性争端。最后,关于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浮出水面。这一密约曾引起国人极度不满,人们担忧日本以此协定为借口在中国边境地区长期驻军,损害中国利益。中日双方经过几轮会谈之后,于1921年1月废除了该协定。

日本政府不时催促中国政府依照凡尔赛条约相关条款谈判解决山东问题。当美国政府拟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太平洋事务的消息传到北京之际,日本态度更加急迫,竟想把山东问题从大会议题中排除,变为中日间的直接谈判。中国政府断然予以拒绝,并且照会日方,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一切机会,依公正、平等原则谈判解决这一问题,但绝不能根据中国政府未承认的凡尔赛条约办理。

接到华盛顿会议正式邀请函以后，部中即成立由我领导的专门机构，办理出席会议的准备事项。基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此次对代表的遴选极其慎重，以确保代表团诸成员能和衷共济，通力合作，并且至少在表面上体现出南北方的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代表团团长由驻华盛顿公使施肇基博士出任，副团长则为顾维钧博士和王宠惠博士，王博士不仅是资深法官，也是南方诸领袖的密友。其他团员如顾问、秘书和随行人员也都经过精心筛选，以便能够有效地协助正式代表工作。当时国家财政拮据，所以不得不从关税中抽取资金，用以支付代表团出使费用。经内阁几次会议商讨，定出谈判原则以便代表团遵照执行。

我本想亲自出席华盛顿会议，因而与秘书、随员预定了下月的各家邮轮公司的舱位，以便随时可以搭乘任何一条穿越太平洋的客轮。然事与愿违，因政局变化而未能成行。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出席阁僚们的星期例餐会，在坐的有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交通总长、内务次长（大总统之弟）和我与一、二位客人。此外，还有一位来自东北的颇具名声的算卦先生，席间，阁僚们问他各自命运的奥秘，让他测算一些只有问卦者自己才知道的事情。算卦先生每承一问就把三枚铜钱向桌面抛三次，依照每次铜钱正反而代表的阴阳组合，画出卦图，然后按图解答求卦者的问题。他说在座的某人命中应有二女，而此人否认，说他只有一女，但稍事追忆，又想起确实还有一女，不过早已夭折。我一向不信江湖算命之术，但经不住同席诸位怂恿，只得求了一卦，问近期能否远行。他回答说：“不能，此间之事让您无暇分身。”在我看来，这无非巧合而已。不过，随后的数月中发生了两次内阁危机，我被迫两度署理总揆，因而确实不能离开。

中国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因其中有关归还胶州湾租借地、铁路、矿山以及战前德国在华特权利益的条款,不能为中国接受,中德两国在法理意义上仍处于战争状态。战后德国急于恢复在华地位,特别是在贸易方面,因此,特派卜尔熙先生(Herr von Borch)来北京商讨两国复交问题。我指定外交部两位参事代表我与德方特使就相关事项谈判解决方案。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中德之间如能尽快达成协议,可使中国在会议上从容自如。德国因在凡尔赛条约生效后处于被惩罚状态,又希望迅速开展对华贸易,所以准备接受中方所提出的全部条件。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双方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缔结协约,1921年5月20日,双方最终签署了协约,德方郑重承诺,按照凡尔赛条约的相关规定,放弃1898年3月6日中德签定的条约以及其他类似条约内所载德国在山东省内享有的一切权利、利益和特权。事实上,战败的德国早已丧失了归还这些权利、利益和特权的资格。

德方还正式放弃了在华的租界和治外法权。至于其国侨民在商埠经营所享权利,准照第三国侨商待遇执行。德驻华使馆不再拥有自己的卫队,自然也就失去了使用馆外练兵场的权利。除了庚子赔款在中德绝交之日就已停付以外,德方还支付了巨额赔款,作为中国参战期间的损失补偿,其中包括拘押德俘等开销。卜尔熙特使交来的支票,是我所签认的支票中数额最大的一张。本协约公布以后,口碑极佳,因为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严格遵照平等互惠原则与外国签定的协约。

正当内阁运转良好,不乏成绩之时,却又不得不改组,在此没有必要详述改组的原因,但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就是总理希望让自己的亲信掌握财政大权。现任财政总长周自齐先生虽与总理为

同乡旧友,但同时他还是对财政金融界极具影响力的某个集团的代表人物。政府总是在财政上捉襟见肘,关税收入在优先支付诸如按期赔付款、外国债务等等专项以后,其结余往往不足以维持现实的行政与军事开销,而大规模举债也是不可能的。此外,还有人急于动用厘金余额的全部或其中大部,作为改善国家公债信誉之用。内阁孕育着危机,当某位总长(即交通总长叶恭绰)违背内阁决议对外签定协议时,危机终于爆发了,总理大为震怒,所以,决定改组内阁,免去财政、交通两总长的职务。

平心而论,这份与外国公司签定的协议本身并无大碍,可能值得一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往同样性质的涉外协议甚多,与本协议享有的权利之间是冲突的,至少已引起几国公使的抗议。为避免引起纠纷,内阁决定在协议签定前,必须通盘谋划,审慎待之,但是,该部未经内阁认可,即擅自作主签押。难怪总理向大总统递交了辞呈。

同一天内阁改组,张志潭和李士伟分任交通、财政总长。张先生空出的内务总长一职,由吉林人齐耀珊先生接任。其余内阁成员大都保留原职。经此阁员更换后,政府的直、奉两系的色彩加重。阁员中来自东北的两人,皆为张作霖大帅的代表。而以次长代理财政部部务的潘复(李士伟先生拒不就职)和交通总长张志潭均紧密依附于总理,必能忠诚地工作,为日后的政府开支筹措更多的经费。由于直、奉两系军阀首领的支持,在未来数月中,政府似乎比以往更稳定、强大。

前面曾提到,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第一期庚子赔款开办的。我由欧洲归来,发现部中金库该款积累越来越多,返还的赔款已远远超过了学校费用所需。但该款的管理并非无可挑剔,账目

制度与审计也有待完善。我决定该款不再由部内控制,另组董事会管理。董事会由外交部总长、次长和美国驻华公使任董事,并制定了董事会管理细则。董事会转变了资金运营的方式,使原存银行仅生微利的状况迅速改观。最后,为确保我的后任无法更改这一方法,特由部呈送大总统签发,以儆来者。后来该会并入1924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基金会董事中,中国10人,美国5人,共同管理美国第二期退还的庚子赔款。

有时外国对中国示以友善态度,竟可间接导致我方政府内部冲突,这也许会让许多外国读者感到费解。事实是这样的,华盛顿会议议定,允许中国海关在原税额征收进口税之外,可以加征2.5%的附加税。因此,国家财政增收,引起各系军阀垂涎,纷纷企图控制内阁以达到占有目的。钻营投机的政客涌向奉天(沈阳)游说张作霖大帅,力争内阁席位。奉系此时在内阁中拥有两席,且不属重要职位,而总理属于直系,财权归直系掌握,财政、交通两部也均由直系把持,因此内阁中直系势力远胜于奉系。张作霖遂邀请其盟兄曹錕大帅相见于北京,并电告大总统,暗示他对内阁人选的极大不满。曹大帅头脑简单、直率,远不及张氏政治上的狡黠,很容易就被说服,同意改组内阁,由梁士诒先生出任总理,这位被称为“财神”的梁氏一向靠拢奉系,不为直系所欣赏。

正当我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竭诚为争取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而奋斗期间,更紧要的是在英、美观察员共同出席监视下,与日本代表为山东问题针锋相对的关键时刻,靳内阁却遭奉系打击,不得不于1921年12月18日辞职。徐大总统召见我,希望由我暂时代理总理一职,我以缺乏内政经验推辞。他向我保证代理仅一个星期,至多10天新内阁即可组成。12月24日,梁士

治被任命为国务总理,我应其邀仍为外交总长(事后得知徐大总统曾以此为条件),张弧任财政总长,叶恭绰复任交通总长。内阁诸员,除新任司法总长王宠惠博士(当时尚在华盛顿)、教育总长黄炎培、海军总长李鼎新和我之外,其余总长皆属奉系,而直系则无一人入阁。

在梁总理招待直、奉两系首领的宴会上,他分别介绍了新任内阁诸公,其后,我应邀报告德国战前、战时、战后的情形。我借此良机吁请和平,坚称无论个人、国家,专靠军事武力称雄绝无善果。德皇曾是一代枭雄,称霸一时,战败后,却出走荷兰,如今仍在那里做寓公。我不知道曹、张两大帅听到这样的论述以后有何感想。但是他们后来的结局却与德皇如出一辙,二人中的一位在1928年由北京退回关外的途中,将达奉天时被炸死;另一位则在1924年离开政坛后,隐居天津,过着多年的毫无快乐的庸碌生活,郁郁以终。

新的内阁名单经过曹大帅的认可予以公布后,他的部属群情哗然,由此注定新政府将是短命的。皆因内阁人选,倾重奉系而薄于直系,令一方欣喜若狂而另一方则懊恼愤恨不已。

不久以后,被誉为“中国的鲁登道夫”的著名的曹锟部将吴佩孚将军即领衔反对总理,他在一系列的通电中,措辞严厉,批评总理亲日误国。特别对他竟然同意日本公使强求我国借贷日款以赎回山东铁路的计划,抨击尤为激烈。中国公众群情激昂,有人提议全民捐款,以代替借款赎路计划。然而热情可嘉,终难挽回已成之事。因此,在这危急紧要关头,总理接受日本使节的请见,显然十分草率。他刚刚接任总理公务,几乎还不了解华盛顿谈判事务的有关情况,也不清楚局势异常微妙的特点。

尽管某些文章有一些相反的说法,但这位总理抛开我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宣言,径自做主答应日本使节的提议却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引起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并非偶然,他可能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和公众舆论可能的反应。这样的结果,不可能不传到正在华盛顿奋战的前方代表耳中,如果隐匿不报,更属不公。代表们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每时每刻都在两位国民代表的掌握之中。其外交对策和谈判策略则由团内公决,重大决定取自北京的指导。如果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的决策与策略与北京的政略大相径庭,人们不难猜想其后果的灾难性。

其时,公众舆论极其关注山东问题。即使是小有不慎,轻言妄动,便会立刻招来猛烈严厉的攻击。假如这个人本来就不被大家所欣赏,政治上树敌过多,或曾有劣迹授人以柄,则攻击者更容易如愿以偿。在我的外交总长的任期内,华盛顿会议召开以前,许多社团代表纷纷来部访问,询问政府在赴会以前有关对日解决山东问题的打算,会议召开期间,也不断有人询问政府对日方强求,是否考虑接受。有一次,数千学生涌到外交部门前摇旗呐喊,强烈要求我出面公开表明对山东问题的态度。面对学生的高涨爱国热情,如果动用武力镇压,将是愚蠢而不幸的。而这个时候如果讲话偶有不慎,也会导致反政府的骚乱。

吴大帅通电炮轰总理,获得直系各省督军的支持,遂使梁氏总理宝座不稳,尽管以内阁和外交部的名义全面释疑,仍无结果。梁氏只得援例告假,出走天津。大总统再次请我署理内阁。我起初不想听命,大总统也承认,此次局势之严重远胜于上次,署理期限必长,但大总统又说:“以目前情势而论,总理与外长兼职一身更有利政局稳定。至于华盛顿会议的问题,可由一人负责,然后由我终

决,以免政出多门,徒增纷扰。”由于他的言辞恳切,彼此诚心相待,我们合作得顺畅无间。他以他的睿智和对国内外形势的广泛了解,最终使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中争得一些利益。

当时正值法国霞飞元帅访问中国,他照例带来其国荣誉军团勋章,准备授予中国政要,不过仅有两枚最高级的大十字勋章(The Grand Croix),原拟一枚授予张作霖将军,一枚授予梁士诒总理。然而,他抵达北京之际,梁先生托病离任去了天津,我为实际上的总理,因此,这项荣誉竟由我接受。其后霞飞元帅见到梁先生时,许诺将由巴黎另寄一枚相赠。

说到勋章之事,顺便我要提及徐大总统对我国赴华盛顿会议代表的奖励,他曾对与会代表分别授予高级勋章,以示优渥。我也在受勋者行列中,被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综计我入阁以来,除获得政府授予两枚勋章之外,还曾得文虎章等勋荣。至于外国政府之赐,除上述法国勋章以外,还曾接受“丹莱堡”大绶章(Grand Cordons of Dannebrog, 丹麦)、“北极星”勋章(Polar Star, 瑞典)、“基督”勋章(Christ, 葡萄牙)、“庇护十一世”勋章(Pius XI, 梵蒂冈)、“太阳”勋章(Le Sol, 秘鲁)等。由于战争关系,德国未曾授勋。

晚些时候,我受命出任驻苏联大使。国民政府为表彰我在日内瓦国联会议上为满洲事件所做的出色努力,特授予本人一等彩玉勋章。早年我曾任教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该校授予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此一殊荣,我终生铭记。依据前清惯例,民国袁世凯、黎元洪和徐世昌三位大总统每逢新年,仍赐高级官员“福”、“寿”字,并常有亲题匾额的眷顾。我也曾获得此项荣耀。在我所得的许多荣耀中,最奇特的莫过于逊帝溥仪大婚时所赏赐的“紫禁城骑

马”恩典。作为政府首脑，遵循先例送达贺仪是职责所在，逊帝以为我必前往宫中祝贺，故有此之赏，以免我从宫门到大殿长途步行。其实，所谓“骑马”，实际上就是乘肩舆小轿。清宫之内，惟有武官骑马。为庆贺逊帝大婚，清宫特制镂花大银杯分赠来宾，以资纪念。

当时访问北京的贵宾中，有美国驻菲律宾总督伍德将军(Leonard Wood)，陪同而来的是福布斯先生(Forbes)。来京途中，沿津浦线各大车站，均布置盛大仪仗队，以示欢迎，甚至午夜时也是如此，当然，这必定会打扰贵宾的睡梦。当我问伍德将军卸职后有何打算时，他回答：“我愿意替中国操练军队，我欣赏沿途所见士兵的强壮体魄和精神面貌。”

曾多次出任法国内阁成员的班乐威先生(Monsieur Painleve)也访问了北京。我国也派遣半官方代表团回访巴黎，并代表大总统接受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所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富丽堂皇的北京协和医院开业之际，引来了许多美国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小洛克菲勒先生(John D. Rockefeller, Jr.)、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文森特博士(Vincent)以及其他一些名人。地处颐和园附近的燕京大学举行落成典礼之际，中美董事和来自美国的朋友与中国教育界耆宿一道出席庆典。民国大总统和外交部都曾给予来宾上佳礼遇。

追忆童年，父亲每逢新春总带我们兄弟几个去戏院观赏京剧。儿时，我特别喜爱武戏和舞灯一类的杂技。后来在上海执教于圣约翰大学时，来华观光的美国朋友，常常邀我一道听戏并为其解说，然而，中国戏院的包厢座位出入不便，而且坐起来十分不舒服，后来，我请戏院人员更换了特制软椅，以便欣赏夜戏，并准备好英文的解说词，以便帮助客人理解剧情。直到徐世昌大总统任期内，

我们才有机会经常看到京剧名角的演出。在总统府招待公使团或外国贵宾时,宴会之余往往紧接着京剧表演,京城名角粉墨登场,演三、四出折子戏,为贵宾献上国剧精彩的功夫与唱段。这一艺术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绝不可能看到。前清宫廷热衷京剧,故京城历来以出名角与名票著称于世。而年轻的皇室贵胄甚至放下架子粉墨登场,往往举办堂会,亲自登台献艺,以酬答朋友。

梁先生任总理时,曾计划发行 9600 万元国内公债,借以偿还各种内外短期公债(其中 40% 是日本债务)。尽管新公债存在着风险,但条款规定的权益和利率均对债权人有利。在我署理国务总理时,内阁召开会议讨论此事,财政总长亟盼举债计划尽快通过。尽管我对举债之事深怀疑虑,然而,我也意识到了梁先生对这个计划能否继续执行的关注。基于对因病离开的总理的尊重,内阁成员及时地同意了公债议案。

结果证明,此次公债的发行,除了偿还所欠日本短期公债之外,制造了极大的混乱。更有甚者,由于公债的真实情况受到隐瞒,前景莫测,因此,该公债实际上成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购买者和存心投机者的坟墓。时至今日,每思及此,我仍感愧疚。

这一用以整理各种内外短期公债的国债,并非如表面上那样简单,其举新债偿还短期旧债的用意,颇使人生疑。因而招致非议,人们指控其中必有情弊。于是政府成立了审查委员会。财政总长(张弧)闻风立即遁走,审查委员会随之审查,果然揭露出许多非法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问题。仅就公债价格波动而言,其涨落就打破了历来公债买卖的价格记录,投机倒把之徒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搅乱市价,乃至捏造海关总税务司已经答应将该公债纳入基金管理之内,一并加以统筹的消息,借此提高公债信誉。尽管各式

各样与公债利益相关的人施压劝说税务司接手,但是税务司始终不肯答应,令人不能不佩服其对信用的珍视。我还记得稍后另一位财政总长设家宴招待总税务司,恳请其接管该项公债还本付息之事,客厅中挤满银行家和前来打探消息的人,都希望抢先得税务司首肯的新闻,以便捷足先登,操纵市价,但是,令这些人失望的是,总税务司仍拒不接手。人为哄抬的市价,第二天便一泻千里。

1922年2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较圆满地告一段落。2月4日,签订了相关条约。虽然在英美两国友好相助下与日本签定的这项条约尚不能完全实现公众的期望,但是,大总统和我均认为,这是一个未失公允的解决办法,似应为大多数有理智的人群所接受。不过,考虑到国内有些心存偏见和不负责任的群体对此次华盛顿会议抱有反感,代表们对这一谈判结果能否获得国内的普遍同意,在很大程度上表示忧虑。当最终协议条款电请我审定时,我立即回电感谢他们的出色工作,并保证一经呈请大总统议决后,即刻回复。公事电文已附上我个人意见,几乎是同时,代表团又来电称:在未接到正式指令以前,代表团将谢绝一切活动。次日一早,我携条款公文谒见大总统请示批准,他立即签发照准。这一官方指令很快就以国务院和外交部的名义电告代表团。同一天,内阁会议决定公布批准的协议。两天过后,关于辽东问题的条约,即人所共知的《九国公约》(The Nine Power Treaty)也正式签署生效。大总统和我均相信两项条约的签定,能获得大多数国人的认可,尽管从表面上看,有可能引发另一场严重的政治冲突。

依据与日本签订的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政府任命王正廷博士担任高级专员,负责与日本谈判接收青岛、胶济湾租借地和铁路

等具体事项。他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使协议得到实施,从而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这一接收行动的纲领是建立在华盛顿会议精神之上的。既然与华盛顿会议相关的重大问题已经全部圆满解决,又因国务总理、外交总长集于一身的沉重负担,令我深感劳累,我在此时恳请卸去总理之职。4月4日,代张弧继任财政总长的周自齐接任国务总理。我得以暂时摆脱政务,前往杭州探亲。

我原希望三位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能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归国,重新组织内阁,同心协力使会议所定有关我国的议案付诸实施。一方面满足国人的期待;另一方面结欢于友邦。不料他们对于立即归国迟疑不决,因为他们把握不准国内舆论对他们的真实态度如何,不久以后,仅有一位归来,另两位仍滞留海外很长时间,错失了良机。日后数年,中国政局日趋凶险,除了山东问题获解决外,华盛顿会议所取得的其它成果都遭到了否定。

梁内阁已然倒了,支持他的张作霖大帅又岂能甘休。北洋直、奉两系军阀,先是相互攻讦,继而拔剑弩张,军事行动如剑在弦上。大总统处于两者之间,手下又无兵将,事实上,只能寄希望于两者之间的均势,居间折衷调合,以保持总统的地位。然而,两系军阀争雄斗胜,互不相让,皆渴望夺取总统之位,不再有耐心等待一年半后的总统改选。此外,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中取得的某些成果,刺激了这些人的政治野心。两系的某些追随者虽然才智不足论,却极为觊觎内阁席位,或其他政府高级职位,因此煽惑他们的主人发难。而一帮失意政客似乎觉得不把政局搅乱,他们就无法浑水摸鱼,故也推波助澜,惟恐天下不乱。

又一次内战的舞台已经搭好,至少决定两系军阀命运的战争序幕已被拉开。据报道是张作霖大帅首先发难,挥师入关,且声称

已征得曹錕将军的同意。紧跟着就是惯行的“通电”骂阵，“指控”、“否认”、“反责”、“辱骂”，这些出自双方帐下的文人政客之手的电文，措辞华丽圆通，激愤刻毒，使通电大战达于白热化。然而，文才虽优，仍须以武略济之，最终决定的因素还是军事实力。张作霖大帅的奉军在长城附近被击败，不得不撤回奉天。京城中的奉系政客由于误选劣马，遂被驱赶下台，遭到明令通缉。张氏本人也被褫夺本兼各职。

5月，我正在杭州短期休假。一天，浙江省长忽然来访，他带来了总理密电，电文称政局正酿危机，敦促我立刻返京。当时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奉张速败出关后，直系军阀就开始谋求恢复第一届国会即旧国会，矛头当然指向徐世昌大总统（他是新的即安福国会选出的，任期五年，还有一年半到期），待逼其下台后，由于当时没有副总统，故旧国会可推曹錕登上大总统之位。

北洋军阀们早已等得不耐烦，他们认为中国的财政危机即将结束，因此不愿未来的利益落人文人总统手中，遂起而竞相夺取中央政权。于是，直系各督军通电徐大总统，众口一辞促其离位。更有甚者，有人甚至建议两总统（包括广州护法政府的孙逸仙博士）应同时下野，以利于国家的统一。由于徐大总统的军方支持者已表示了让他离位的愿望，所以大总统也无心恋栈，于5月31日通电宣布下野。6月2日，离京去了天津。国务总理周自齐暂摄总统职务。

我返京后所看到的形势是：直系首领决定采用过渡性措施，起用退休的黎元洪大总统和恢复旧的第一届国会，让黎氏任满所剩的总统任期（所剩任期时日，有不同的计算方法）。随之尽快拟定新法选举大总统。显然，如此周密的考虑，将给军事政变找到合法

装饰,同时为曹锟走上大总统之位提供了捷径。前任大总统黎公未尝不愿结束隐居天津的生活,尽快重返北京,但是他提出了一些善意的却又难以实施的条件,譬如废督裁军等,诚如中国成语所言,这样做无异于与虎谋皮。然而,军阀们同声顺从其意,遂使天真的前总统为他们的“诚恳”所感动,接受了出山之请。几天之后,他回京复职(1922年6月11日)。

摄理总统的周自齐总理将政府移交黎大总统,出乎意料的是大总统竟邀我出面组织新内阁,其理由看来非常简单,他担心列强不会像国人那样容易接受此次政变,极可能在正式承认问题上举棋不定,如此将陷其于困难之地。他指望我帮他渡过难关。因为我在驻华外交使团中口碑不错,由我作为他的总理出面组阁,有利于获得承认。虽然我对北京的宦海生活已感乏味,但是在此关键时刻,岂能袖手而去,遂同意出任总理。这也是在他许诺一俟事定即准我退休的情况下,我才答应的。于是,新内阁组成,应大总统的请求,我以国务总理兼任外交总长。内阁中除了几位独立人士出任总长外,还包括吴佩孚大帅(他是当时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的两位密友。被任命为陆军总长的吴佩孚大帅,则坚辞不就。

在当时的广州,孙博士也遭受严重危机。南方军人首领陈炯明发动政变,不仅不听从号令,而且炮击总统府(1921年4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非常大总统)。这期间由于动乱和个人健康原因,我的老上司、著名的伍廷芳博士逝世。当时他正在广州帮助中山先生的护法政府(1922年6月他辞世时,行年八十,虽然他一向素食,自信人生可达一百五十岁)。

恢复后的第一届国会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政府行政制造了许多麻烦。国务总理与内阁成员既然需要国会通过,那么,以往

的经验证明,各议员不会对利用权力逼迫政府让步的事情踌躇不前,因此,政府无法抗衡这样的权力滥用。众议院议长仍是吴景濂先生,我在1909年与其相识于奉天,1913年,在北京正是他提议国会通过我驻德公使的任命。1922年,他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周围蚁附着一群年轻的议员,内阁沉浮,皆由其喜怒操纵。而本届国会肩负着产生下届总统的使命,更使其权力和声望达到了顶峰。自8月中旬国会复会、议员就位后,不仅内阁,甚至大总统都必须惟其马首是瞻,听从呼唤。在此为国家服务的希望已经极为渺茫之际,我如果继续供职,徒取自辱而已。此外,我坚信倘若我离任,不乏其人愿意接任这一职位。7月,我履行当初的约定,毅然辞职,遂携眷乘专车,赴北戴河海滨休养。

外交总长任内,令我难以忘却的外交事件是金法郎案。该案一开始便引起了我的关注,后来又引起舆论哗然。法国政府当时急欲仿效美国先例,通知中方,表示也愿意减免部分庚子赔款,但是要求中方答应退款用途的条件,即优先恢复中法实业银行,所余部分用作中法教育文化事业经费。顾名思义,中法实业银行为一联合金融机构,既然停业,清算财产、重新评估是一项庞大的计划,需要时间与机会,然而,法国减免庚子赔款总额尚不足以完成上述计划目标。因为法郎在战后贬值,所以法方要求中国以美元折算支付赔款。这一变更货币支付赔款的请求,法方认为符合1901年条约的相关规定,条约规定不同外币价值依其含金量计算。

外交部就法方退款的提议作出答复:中国政府感谢法方的友好之意;同意退款之专项用途;至于今后支付赔款是否使用金法郎,或其等值的货币代替现行的电汇方式,事关重大,牵扯到1901年条约参签的其他国家,故须经财政部仔细研究之后,再做决策。

就对该案的承诺而言,未超出外交公务的范围。我辞职后不久,1922年8月,该案由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及其继任者接管。外间谣传在我任期内,中国政府已答应法国之请求,以金法郎支付赔款。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此请求在当时既未被国会批准,也无官方文件批准。1923年,我曾用英文撰写出版一本小册子,完整叙述了本案始末。我任期内中国政府从未答应金法郎的请求的最好的反证是,此案是在1925年4月最终得到解决的。而且,顾博士与法国公使之间的公文往来也可做为佐证,他在公文中以儒雅坚决的措辞,指出了法方请求的荒谬。

有关本案缘由,至今有件趣闻不曾公开,现披露给读者。有位著名中国政客,曾为法方要求的实现而卖力,一日来访,谈论主题时,他信口许诺,倘若我能促成此案,可以收到50万美元的酬金。我笑而答之,感谢盛情,并称部中正缺支付驻外使馆的经费,我将愉快地用此佣金救急。该来访者从此不再提及此事。

徐大总统在处理外交问题上显示的睿智与判断力,令人叹服。毫无疑问,卓识才具来自他渊博的中国哲学与历史的知识。他拥有丰富的封疆大吏和中枢柄政的经验,加上他天赋超凡,在我曾服务的五位国家元首中,徐大总统的人品与学识,确实胜人一筹。他属于那种优秀的传统学者兼政治家的类型,除了不擅公开演讲以外,与英国历史名相相比,毫不逊色。他们和他一样,都精通本国的文学典籍,在这方面造诣远胜于物理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者,晚年隐居天津时,汇编清朝北方名家的哲学与文学丛书,卷帙浩繁,多达数百部,另外还有一部诗歌。他的书法在当时已颇有名气,70岁时又习绘画,水墨作品极富成就。他年过八旬,无疾而终,令人称羨。

袁、徐两位大总统一直保持着前清早朝传统，晨兴理事。前者总是每天召集政府要员共进早餐，议论紧要政事。而后者徐大总统，我曾多次在冬日破晓之际入府议事，其时各房仍灯光通明。两位大总统开始办公议事的时候，北京大部分市民仍在睡梦之中。袁大总统保持军人作风，经常身着戎装，脚踏马靴。而徐大总统则长袍马褂，仅在正式典礼时，方穿西服。徐大总统公务之余，读书栽花，自娱时光。而袁公似乎从未有过这样的闲情逸致，从早至午夜，伏居私室，与众多访客商讨要事，绝无空闲时刻。两公的家庭情况也不同：袁公广置姬妾，子女众多；而徐公像教徒一样，只因正室无出，才纳一妾，育有二女，家庭生活非常简单自然。